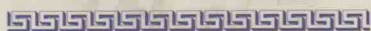




新时期 汉语语法学史

(1978—2008)



邵敬敏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书获得广东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资助

(批准号 04ZD74001)

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

(1978—2008)

邵敬敏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邵敬敏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7390-5

I. ①新… II. ①邵… III. ①汉语—语法—语言学史—
1978~2008 IV. ①H1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759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

(1978—2008)

邵敬敏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390-5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定价: 47.00 元

陆俭明先生序

《史》，重要；《史》，难写。

科学研究的要义就是以“已知”求“未知”，就是不断地继往开来。任何学科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已知”者，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而学术史的一个最基本的目的与要求就是尽可能如实地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成果的内容、成果的形式、成果的核心思想、取得成果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过程，以及研究者的思路、取向等，叙述、论说清楚，以便让后人往前走的时候能有所继承与借鉴。由此可知，学术史在推进科学研究不断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也可以说是“《史》，重要”之理据。

可是，《史》，难写；即使是一个分支学科的学术史，也不容易撰写或编写。（一）首先，要求撰写/编写者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解、掌握有关所要撰写/编写的《史》的那一学科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反映研究成果的已发表、出版的论著，包括成果的应用及其效应，包括人们对成果的评价，包括对还健在的成果研究者的访谈实录等。（二）其次，要求撰写/编写者能合理、科学地理清所要撰写/编写的那一段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重要理论、重大事件。（三）再有，要求撰写/编写者对整个历史进程和其中的关键人物、重要理论、重大事

件作出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评论。(四)要求撰写/编写者既要公正、客观地指出前段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与缺憾,又要能站在当今的研究前沿展望未来。这就是“《史》难写,即使是一个分支学科的学术史,也不容易撰写或编写”的原因。由此也可知,写《史》要有些精神与勇气的,因为学术史的撰写/编写者除了需要广泛搜集资料、勤奋耕耘之外,还要有驾驭史料的能力,要有很强的对史实分析、综合和概括的能力,更要有敏锐的学术眼光,要有“放眼世界”的视角,要胸有成竹。

然而写《史》再难也得要有人来写。凡事起头难,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学科的学术发展史一步到位;能尝试往前迈进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是科学发展道路中了不起的成就了,因为科学发展需要《史》。

邵敬敏,我钦佩他的勤奋,更钦佩他的精神与勇气。他有雄心,更有开创精神。他不仅在现代汉语语法的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学界公认的成绩,更在撰写汉语语法学史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先后已经撰写出版了《汉语语法学史稿》(独立完成,1990年初版,2006年修订版)和《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与方经民合著,1991年版);此外,他还跟潘悟云等合作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100年·语言卷》(2005)。学界如何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00年·语言卷》,我不知;但对《汉语语法学史稿》和《中国理论语言学史》这两部学术史,学界都给了较好的评价。现在他又将新撰写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的书稿放在我的案头,并要我写序。我断断续续地阅读完了《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的书稿,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

(1978—2008)》“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立体交叉评述模式”——全书先是“导论”，对新时期 30 年汉语语法研究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评述，提示了贯穿全书的主线；接着分“理论篇”、“人物篇”、“本体篇”、“应用篇”四个板块展示了作者对这一时期汉语语法研究史的多角度、多方位的立体评述与认识。他的评述、他的认识如何，这需要留给学界和时间去评论。我想其中有不少会为大家所肯定，有的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非议。这是作为一部新《史》往往引起的正常反应。这里我要肯定和赞赏的是作者所采用的“立体交叉评述模式”。这是一个创新的模式，也是一个成功的模式。正如作者在《自序》里所描述的那样，“导论”是对这一段汉语语法研究史的宏观的把握，交代了贯穿全书的主线；“理论”是语法研究的灵魂、核心；“人物”是研究的主体，正是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构成了学术发展史的基本框架；“本体”是学术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学术的根基；“应用”是语法研究的最本质的归宿，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应用，一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类自己。“这四个板块，就是四根支柱，撑起‘语法学史’的大厦”。

1978—2008 这三十年，汉语语法研究，不管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还是方言语法研究；不管是本体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从描写到理论到应用，确实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有的是具有突破性的。其成绩概括起来说：

一、汉语语法研究的视角大大开阔了，研究的理论方法更趋多元化了。

二、对语言事实的挖掘，对语法现象的解释，更深更广了。

三、进一步加强了理论思考,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

四、加强了汉语语法的应用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效应。

五、进一步加强了内外交流——跨学派的交流,跨领域的交流,跨语言的交流,跨学科的交流,跨国境的交流;出现了内外互相渗透,互相吸收的可喜现象。

六、研究队伍大大扩大了,并涌现了一大批研究素质好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术中坚力量。

但是,我们也需看到所存在的问题,虽然这并不是主流。突出的问题是:(一)由于错误的政策导向,造成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之中出现一种浮躁之风。这既不利于年轻人的学术成长,更不利于整个学科的学术发展。(二)自乔姆斯基(N. Chomsky)提出生成语法学理论以来,这半个多世纪国际上语言学的发展极为迅速,形成了形式、功能、认知等不同学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可喜现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碰撞的结果,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了语言研究。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这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的汉语语法研究会发展得更好些。遗憾的是在我国国内存在着两种不良偏向——一是对国外各种各样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在没有深入学习、了解,没有真正看懂、吃透的情况下,随意引用,表面追随,造成某些贴标签的不良风气;二是对国外各种各样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在没有深入学习、了解,没有看懂、吃透的情况下,持一种轻视甚至贬斥的态度,呈现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种偏向都不利于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发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中

国不仅语言繁多,语言之下,不管是汉语、藏语、苗语、景颇语、壮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都还有众多复杂的方言;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有着语言富矿的国家。我们应将开发中国这一语言富矿,特别是开发汉语这一矿藏,作为己任,为建设中国的语言学事业,为推进国际语言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不管是形式派、功能派、认知派,都承认人类语言表面看千差万别,但具有一定的共性,而且都把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别语言的个性特点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任务,尽管各派探索的目标、要求以及期待值有所不同。当今的主流语言学理论,主要是在研究有形态的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语言学理论对其他类型语言的描写与解释当然会很有用,但毕竟会有某种局限,特别是用来分析、描写、解释像汉语那样的所谓“孤立语”。加强对汉语的调查研究,这无疑有助于对人类语言共性的探索,会丰富普通语言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推进整个人类语言的研究,而这也正是我们汉语学界应承担的任务与职责。我们已有光辉的过去,我们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是为序。

陆俭明

2010年6月12日于北大

邢福义先生序

读完敬敏兄的新著《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特别想说下面三句话。

第一句：我振奋于新时期汉语语法学界的“三多”。

一为学术活动多。其盛况，前所未有的。比方说，从 1981 年起以当时 40 多岁的中年学者为主的“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截至 2008 年，连续举办 15 次，每次会议之后都出版一本论文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比方说，1986 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青年）”，标志着新时期培养出来的一代语法学者迅速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了声势浩大的生力军。这一研讨会，定期连续举行，进入 21 世纪以后改名为“国际研讨会”。其他研讨会，特别是各地语法研究的学术沙龙，不胜枚举。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激发了研究活力，使得汉语语法研究这一领域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二为人才迭现多。仅从年龄上看，本书列出了四个层面：老一辈，20 世纪 40—50 年代成名的；中生代，20 世纪 50—60 年代初期大学毕业，80 年代的主力军；新中生代，以 1978—1980 年入学的研究生为主体，大多在“文革”前大学毕业；新生代，以 20 世纪 80—90 年代新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为主体。不仅如此，本书还用较大篇幅罗列和介绍了海外的多位学者。任何研究的进

展,都以“人”为本位。“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的迭出是学科兴旺发达的保证。本书向读者展示了本学科领域学术群体的一幅大彩照。

三为成果产出多。在理论上,汉语形式语法、汉语功能语法、汉语认知语法、汉语语义语法、语序变化以及类型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一般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语法具体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在内容上,现代汉语共同语语法、汉语历史语法、汉语方言语法、汉语口语语法、汉外比较语法、中文信息处理语法、文化视角语法等等的研究成果,作者分门别类地一一介绍,琳琅满目,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书向读者展示了新时期本学科领域千姿万态的一道道风光景色。

事实证明,诚如作者所说:“新时期的中国汉语语法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第二句:我赞叹作者的“三力”。

一为穿透力。学术穿透力,来自学术感悟之灵利和学术眼光之敏锐。那么多的著作,那么多的论文,仅仅搜集,已然不易,何况不但一一罗列,而且有的还要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有的更要作篇幅较长的述评!

二为概括力。学术概括力,来自学术根底之厚实和逻辑思维之畅达。本书在写法上采用了“立体交叉评述模式”。先是“导论”,接着是第一编“理论篇”,第二编“人物篇”,第三编“本体篇”,第四编“应用篇”。“导论”是宏观的把握,是整体的反映。“理论”、“人物”、“本体”与“应用”,是四根支柱,撑起“语法学史”的大厦,展现了互补辉映的格局。如此建构的鸿篇巨制,需要强劲的分析能

力和归总功力。

三为涵容力。学术涵容力,来自学术视野之宽大和治学襟怀之广阔。本书的“理论篇”,包括语法学流派、理论探索以及争议问题三大主题的评析;本书的“人物篇”,包括各种走势代表性学者的评介。为了保证持正公允,以利于百花齐放,书中如何取舍,如何排序,特别是如何表述,的确是“最费心机”的。常言:“宰相肚里能撑船。”史学家就应该是好“宰相”,应该有像大海一样接纳百川的“海量”。

第三句:我同意作者“存在问题和缺陷”的判断。

在本书的结语“21 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趋势”部分,作者一方面强调:“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坚信,在 21 世纪,汉语语法研究必将进一步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取得巨大的硕果,并且为世界语言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缺陷,离开真正揭示汉语语法的奥秘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以为,在为取得成绩而欢欣鼓舞的同时,多想想问题和缺陷大有好处。

汉语语法研究,始终指向一个目标,这就是:汉语语法事实的客观规律性。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好像眼前是一座座奇山峻岭,里头到底有没有、有多少矿藏,地质学家们并未完全探索清楚。面对语言事实,我个人常常慨叹自己的无知。举个例子:“苗人视苗鼓为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魂,祖先传下六六三十六套鼓路,各部落的打法虽有不同,但只要你抓起鼓槌跳起舞,苗族老人们一眼就能辨出你的祖先住在哪寨哪峒。”(《人民日报》2001 年 10 月 25 日)如果只说“三十六套”,这个数量结构里

的“三十六”可以分析为数词或者数词结构,大概没有人再提问题;然而,上例说的是“六六三十六套”,这个数量结构里的“六六三十六”当然也可以分析为数词结构,可是,对于诸如此类的数词结构,怎么做语法分析啊?老实讲,我很怕有人问我。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碰到的问题太多,而自己的认识却太肤浅。

目前,学风浮躁。有些行政性的规定,形成了导向,容易把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引向急功近利。于是,写出来的文章往往“长平快”。文章长,质量平,写得快!打排球,“短平快”是一种很好的打法;写文章,“长平快”却对学科发展不利。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需要一代接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需要寄希望于青年。假如“长平快”成为惯性,会影响一代代青年的研究质量。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这一点。

做学问难,做学问的学问,尤其难。敬敏兄不仅会做汉语语法学这门学问,写了不少书文,而且会做汉语语法学这门学问的学问,在出版了《汉语语法学史稿》(1990)二十年之后,又向读者奉献了《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这部新著。当然,任何人写学科发展史,都不可能把所有书文全都读完,即使是读过了的,评价起来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取值倾向,因此,对于人物或书文有的可能介绍得多一点,有的可能介绍得少一点,有的还可能会引起争议,这是在所难免的。我相信,无论如何,大家都会怀着赞佩的心情,感谢敬敏兄的可贵努力。

邢福义

2010年5月1日

自序

一 另起炉灶：两本史书的渊源关系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我会对中国语言学史，特别是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情有独钟，而且居然前后跟四本史书有缘。前两本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写的：一本是《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商务印书馆 2006 修订版），一本是跟英年早逝的方经民先生合作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原以为这以后的研究历史该由年轻的朋友来续写了，没料到，还会在 21 世纪初应潘悟云兄之邀合作主编了一本《中国社会科学 100 年·语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接着一发不可收，居然“雄心勃勃”再写了一本，这就是手头这本刚刚杀青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

1980 年下半年，我还是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现代汉语硕士学位的三年级研究生，一个偶然的机，看到山东大学马松亭先生写的《汉语语法学史》的油印本，厚厚的一大本，记得这还是我的硕士生导师王维贤先生借给我的。我一边看，一边想，越看越佩服，因为马先生确实读了不少书，也颇有心得体会，但同时也感到有点遗憾，因为这本书不太像“史”，主要缺少纵向的梳

理和横向的沟通,倒像一本语法专著简介。那时有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劲头,竟然也不自量力想动手来写一本真正有“史味”的汉语语法学史。当然,我自以为有一定的优势,那就是: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1966年毕业的,五年的语言学科班训练以及三年语法专业的研究生学习,使我拜读了不少汉语语法论著,也因为待过北京和上海、杭州,有幸结识了一批汉语语法学界的知名学者,而且也比较熟悉学术界的师承渊源关系。当我把这一想法向恩师王维贤先生透露时,他老人家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可以说正是他的认可,才促使我下决心来做这件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在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前后,就开始了资料收集以及撰写初稿的工作。即使在等待毕业分配最艰难最苦涩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停止过写作。1981年年底,在拖延了好几个月之后,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我,我正式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不仅回到了上海这个阔别了20年之久的第二故乡,而且来到汉语语法研究的又一个重镇,更令人欣慰的是有机会得到著名语法学家胡裕树、张斌和林祥楣等先生的具体指导,更深入地了解到海派文化和海派语言学的真谛。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汉语语法学史稿》终于完稿,王维贤先生亲自审读了前半部,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朱德熙先生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满怀希望地找到上海教育出版社,老编辑姚芳藩先生接收了稿件,他还请了资深编辑陆尊梧先生帮助审阅,最后回答说:可以出版,不过需要修改。这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讲师来说,已经是个相当令人振奋的消息了。我答应马上修改,而且还比较自信。不久就把修改稿送到了出版社。可是没想到,

这一放就是两年。我年轻脸薄,不好意思去追问,一直到了1986年,好像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这才硬着头皮打电话去问姚芳藩先生这本书到底还出不出,他的回答绝妙:“没说不出啊!”话锋一转表示希望我再修改一遍。尽管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出于无奈,只好勉强答应了。事隔两年再重读旧稿,这才发现,问题还真的不少,如果不改就这么出版了,可能会遗憾一辈子。因为这些年来,我一方面做了一些汉语语法本体的基础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应杭州大学《语文导报》的邀请,也写了一些汉语语法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一方面我应邀参加了中年学者的语法讨论会,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了青年学者的语法研讨会,不但结识了不少学术界的朋友,也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走势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句话,以前虽然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还比较粗浅,比较朦胧;现在眼光开拓了,尖锐了,比以前清醒,也比以前深刻了。我从内心感受到,初稿确实应该修改,而且要大改,把自己新的想法写进去,把20世纪80年代新的研究情况以及发展趋势写进去。坦率地说,这本《史稿》没有这次重大的修改,就不会有后来学界的嘉许。我从心底里感谢姚芳藩先生。198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终于答应正式出版,本来朱德熙先生已经答应为我写序,可惜校样出来时,他已经去了美国。胡裕树先生慷慨答应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对该书给予充分的肯定。1990年该书正式出版。1993年获得华东地区图书出版优秀奖,1994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1995年,由于胡裕树和王维贤先生的大力推荐,获得首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并且被绝大多数的汉语言文字学(语法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指定为必读参考书。该书出版以

后,在汉语语法学界引起一定反响,吴继光、尹世超、戴耀晶等先生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书评,尤其让我深感荣幸的是吕叔湘先生的首肯,他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惠赠大作已断断续续翻阅一过,取材宏富,分析细密,不但胜过同类著作,在近年出版的语法论著中也不可多得。”他还热情地向海内外的学者推荐此书,据说韩国许璧先生和日本鸟井克之先生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两本著作就基本上采用该书的框架和观点。

迄今为止,有关汉语语法学史的专著,已经出版近 10 本,比较有影响的是三本:林玉山先生的《汉语语法学史》、龚千炎先生的《中国语法学史》和拙著。前两本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是,他们的论述基本上只是局限在 1966 年之前,对 80 年代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龚著的修订本补充了部分内容)。

1996 年,我的师兄、商务印书馆的张万起先生策划出版一套 1949 年以来的汉语语法丛书,这一想法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在给张万起先生的信中,慎重地推荐了拙著《汉语语法学史稿》入选。后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丛书没有能够如期出版,但是商务印书馆还是有兴趣出版该书的修订本。张万起先生和周洪波先生几次都表达了这一意向。2001 年,我刚结束了香港商务印书馆教材编写工作回到上海,就下决心开始修订了。

一开始,我就确定了修订的原则,即修订工作应该集中在 1978 年以来,而且要加强理论学派与发展趋势的研究。但是事实上,修订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远远没有我当初写这本书初稿时那么顺畅。主要原因是:第一,没想到新资料那么多,这 20 多年的语法研究论文和著作浩如烟海,其广度和深度是前 80 年根本无法比

拟的。第二,我们目前的资料信息工作还很落后,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核查,手头可以参考的索引,只有徐烈炯、王志洁主编的《汉语语言学书目(1980—1997)》(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以及刚刚出版的《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 1991—1995》(商务印书馆 2003)。第三,80 年代初期,我的教学工作比较单纯,可以专心致志地去写作,而且年轻笔头也快;而现在杂事繁多,年近花甲,文思肯定没那么快了。而且 2002 年我又正在着手工作单位的调动,即从华东师范大学正式调入广州的暨南大学,这自然也要牵涉不少精力。

幸运的是 2004 年初我应邀到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任教,对象是研究生班。课时不太多,因为是客座教授,系里的杂事,人家一般也不来麻烦自己。这样,我反而可以抽出时间,集中精力修改书稿了,而浸会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也为我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写着写着,忽然发现,1978 年以来的内容跟原作相比,几乎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说,1978 年以来的章节已经全部推倒重来。重写的部分已经超过 30 万字。我忽然觉得,不如独立出来成为一本新书,这一想法得到我的好几个朋友和博士生们的支持。

这样一来,原来的计划就必须作比较大的变动:《汉语语法学史稿》继续按照原计划搞一个“修订本”,基本框架和内容不动,只是做局部调整,并且对一些明显存在的纰漏进行修补,大体保持原作风貌。另外我打算另起炉灶,再写一本新书《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

2005 年,我以此为题申请广东省教育厅的重点研究项目,很幸运获得批准。这样我就计划把论述的时间段从 2004 年放宽到 2008 年,从 1978 年算起正好 30 年。2010 年新年,刚刚从台湾开